

# 东北抗日游击 战争史略

李鸿文

吉林教育出版社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日本 帝国主义侵占东北

### 一、柳条湖事件，日本悍然侵占东北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蓄谋已久，这是它推行其“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

1927年，当中国北伐战争烈火延烧至黄河流域，奉系军阀末日即将来临时，日本帝国主义急不可耐地直接出兵山东，企图阻止北伐进军。同时，急忙召集“东方会议”，谋取“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sup>①</sup>。以武力侵占东北，业已提上日本政府的议事日程。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并波及了日本。为转嫁这一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日本加速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这一时期，欧美列强深陷经济危机漩涡之中，无暇它顾；自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至中东路战争，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国内，南京政府虽然号称“统一”了中国，新军阀势力却依然四分五裂，混战不已；蒋介石更动用重兵“围剿”南方的工农红军；张学良“易帜”后，虽然保持了奉系的东北政权，却又助蒋参与新军阀的战争，十数万有作战能力的东北军相继入关，东北防务大为削弱，忘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虎视眈眈。日本侵略者视上述情势

---

<sup>①</sup> 山浦贯一：《森格》。转引自《太平洋战争史》第一卷第62页。

为侵占中国东北的最好时机。到1931年上半年，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等法西斯军事势力这一积极主张武力侵华的急先锋，业已再也按捺不住急切侵华的心情，到处煽动侵占“满蒙”狂热，加紧策划军事占领中国东北的阴谋活动。

为制订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和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多次秘密组织到北满、辽西等地进行“参谋旅行”，从事战地侦察。同时，日本军部积极调兵遣将，关东军加紧实战训练，频繁开展攻城演习。1931年4月，派遣由日本北方士兵组成的多门第二师团，替换驻中国东北的部队，以适应在寒冷地带的作战。7月，又向朝鲜增调一个师团，以便及时支援在中国东北的日军的侵略行动；改变关东军的配备，使其进入临战体制。还特由日本调运攻城重炮，秘密设置在驻沈阳的日本独立守备队院内，并已测量好沈阳的每一重要目标的距离，随时准备发射轰击。

为制造侵占东北的借口，同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在吉林省长春县挑拨中国农民与朝鲜农民的关系，制造流血的“万宝山事件”，借以动员日本朝野反华舆论。8月，又利用日本军事间谍中村大尉被杀事件，加剧紧张局势，叫嚣“将以武力解决”。战争业已迫在眉睫。

日本政府和军部立即任命曾经担任过张作霖顾问、对东北十分了解的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直接指挥军事占领中国东北的罪恶行动。这个刽子手一到任便马不停蹄相继前往沈阳、公主岭、长春等日本侵略军集结与出击的重要地点，检阅各部的“应变准备工作”。

日本帝国主义经过多方密谋策划和充分的准备之后，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是夜，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几个中队

便待机行动。该大队所属第三中队——柳条湖分遣队的几名士兵，在事先早已选定的河本末守工兵中尉带领下，按预订计划，到达沈阳北郊距中国驻军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段，于10时20分将路轨炸毁，并立即向北大营开枪射击。埋伏在附近的第三中队马上按照计划规定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报告了日本奉天特务机关和守备队第二大队本部，反诬北大营中国士兵炸毁南满铁路，随即向北大营中国驻军发动军事进攻。当时，守候在特务机关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得到报告后，即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令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进攻北大营，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进攻沈阳城。

此时，刚刚返回旅顺不久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接到板垣的急电后，立即发布命令，令日军第二师团等部队迅速攻占沈阳，令南满铁路、安奉铁路（今沈丹路）沿线日本驻军即刻攻占铁路沿线的安东（今丹东）、本溪、营口、长春等地。同时，电请驻朝鲜日军越境增援。

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王以哲部官兵在日本侵略军冲入营内时，虽曾被迫自卫还击，但是却接到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参谋长荣臻转达当局“全取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只好忍痛于19日晨冲出日军包围，撤退至东山嘴子东大营待命。北大营遂由日军占领。

与此同时，关东军第二十九联队也迅速攻进沈阳，占领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宪兵司令部、警务处等重要军政机关，还占领了电报局、电话局和各大银行等电讯设施和金融机关。一夜之间，沈阳全城沦入敌手。

9月18日夜至19日，日本侵略军在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全面出击，先后占领了复县、盖平、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公主岭、长春和安东、凤城、本溪、抚

顺等大量城镇与交通枢纽。

日军占领沈阳、长春后，即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移至沈阳，第二师团集结长春。同时，驻朝鲜的日军一部越境侵入东北，填补了第二师团北移后的防务。

沈阳失陷后，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的吉林边防署参谋长熙洽便不准备抵抗，下令吉林驻军全部撤出吉林城。9月21日，在日军第二师团沿吉长铁路进攻吉林时，熙洽派人与日本侵略军谈判，无条件投降。当天午后，日军即行占领吉林。23日，日军又沿吉敦铁路续行东进，相继侵占蛟河与敦化。

9月23日至25日，日军又西进侵占郑家屯、通辽、洮南与新民等地。

至此，时仅一周，日军即攻占城镇和战略要地30余处，辽宁、吉林两省的一些重要地区即为敌有。

当时，日本发动进攻的侵略军，包括原驻东北的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一部，合共2万余人，而东北三省的东北军除调到华北10余万人外，尚有15万以上的兵力。日军以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共500人的兵力即攻下了东北军第七旅7000余人驻守的北大营，日军又用一个联队的兵力攻占了诺大的沈阳。东北军几倍于敌，却几乎不战自退，完全是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结果。

此时，蒋介石南京政府正在调集30万兵力“围剿”长江两岸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并连遭失败。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行径，却不一兵一卒，仍然采取了一贯可耻的退让的态度。日本侵略者从1928年出兵济南，屠杀大量中国军民，而蒋介石却不许军队反击的事件中，便认为国民党政府软弱可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接连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中，又一再电令张学良“隐忍自重”，“无论日

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以不抵抗，力避冲突”<sup>①</sup>。因此，“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毫无反击日军侵略作战的准备，东北军和东北各省的主要军政首脑几乎都远离职守。“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sup>②</sup>电告东北当局。张学良和东北军依然完全遵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结果不战自退，驻在辽宁的部队 5 万余人辗转退至锦州、辽西。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国际联盟召开大会。国民党南京政府不动员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却幻想国际联盟“主持公道”，重演“三国干涉还辽”的旧剧。国联接到中国的控诉后，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企图将祸水引向苏联，不愿制裁日本，反而予以偏护。因此，虽然多次开会，先后作出三次决议，却向中日两国提出双方撤兵，避免事态扩大的“紧急警告”。国联的决议，根本不区别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实际是纵容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国联的这种颠倒是非的决议，南京政府竟也表示完全接受。继之，国联又决议限期日本撤兵，却又附加日本侨民须得中国的保护为条件，实际上成为日本拒不撤兵的借口。不久，南京政府提出了“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国联急忙予以同意，列席国联会议的美国代表甚至提出由英、美、意等国派兵驻守中立区的计划。实际上，这是各帝国主义列强反对日本独霸，乘机插足中国东北，实行共管。后来，虽然又要求日军从占领区撤退，却赋予日军自由“剿匪权”这一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条件。

国际联盟的纵容与南京政府的软弱，只能更加鼓励日本帝国

---

① 均转引自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第 163—164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转引自《“九·一八”事变史》第 166 页。

主义的侵略行动。

1932年2月至同年7月，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到日本和中国东北现地调查。在该调查团最后编写的报告书中，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和阴谋予以承认，并作了一定的揭露，但却偏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并鼓励日本进攻苏联。最后竟仍然坚持提出共管和瓜分中国东北的主张，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的野心。

当然，中国并非孤立的。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引起了世界各国广大人民群众和正义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同声谴责日本的侵华罪行，同情并声援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其中，苏联政府和人民在道义上虽然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自9月下旬以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屡次发表声明，说：“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巨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但是，苏联却过分强调了当时各个帝国主义一致进攻苏联的危险性，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东北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因此，为竭力避免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爆发帝国主义反苏战争，又一再向日本声明：对中日战争采取“不干涉主义”，以至向日本提出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苏联政府的这种中立主义态度，实际上无助于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大侵略，因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重要目的，不仅是将它作为继续侵略中国关内的前进基地，而且同时也是将它作为今后侵略苏联的基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观察到苏联政府的不干涉立场后，便放心大胆地侵占了全部中国东北地方。

## 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东北人民反日潮流高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斗

争的最前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事件宣言》，同月22日，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中共满洲省委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在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沈阳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9月21日，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在这些抗日号召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的侵略罪行，揭露了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抵抗主义的可耻行径，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东北同胞誓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将侵略者驱逐出中国东北的决心，号召各阶层群众采取罢工、罢市、罢课，以至拿起武器，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振奋了各阶级、各民族的斗争精神，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运动的高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北平市委作出了迅速发动群众，领导各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决定。不少学校里的共产党组织或党员通过自己的影响，将学生会改名为“抗日救国会”或“反日会”。20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通电全国，要求“速息内战，武装民众”。21日，流亡到北平的和在北平的东北学生3000余人成立了“东北学生抗日会”。9月27日，北平学生抗日联合救国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全国工农兵学商各界联合起来，武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一天，流亡到北平的闫宝航、高崇民等爱国人士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发动和组织东北民众的抗日救国斗争。

上海群众性的抗日高潮迅速发展。从9月24日起，10万学生举行罢课和抗日示威。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各界群

众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

此外，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群众，也都纷纷要求南京政府抗日。不久，各地组织请愿团，直接到南京督促国民党政府迅速对日作战。9月28日，上海、南京两地学生4000余人前往南京政府外交部请愿，捣毁外交部，痛打外交部长王正廷。11月5日北平组织了大规模的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呼吁“国难当前，不容再事内争”，“团结对外”。12月上旬，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北平几千学生组织南下示威请愿，途中汇合大批山东学生，到南京后又联络各地请愿学生举行总体抗日示威，但却遭到南京政府的血腥镇压。

此时，群众性的抗日斗争已从学生界、工人界扩展至工商界，他们提倡抵制日货，经济绝交。抗日救国确已成为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

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之下的东北各阶层群众，除极少数的民族败类投敌卖国之外，广大的工人、农民、学生、工商业者，以及许多爱国将领、爱国人士均积极要求抗日，反日浪潮迅速席卷东北各地。

各地学生首先以停课、罢课、示威游行来反抗侵略者，许多人脱下学生装，参加抗日部队与抗日士兵一起直接对日作战。城市工人便以罢工、怠工的行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满洲罢工斗争是前所未有的”。广大农民纷纷夺取武器，组织大刀会、红枪会，回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沈阳在日本侵略军的直接占领下，工人、学生、商人自动停工、停课、停市，以示反抗。沈阳兵工厂的一批工人离厂到外地参加抗日义勇军。

在尚未被日军侵占的哈尔滨，中国共产党北满特委与哈尔滨

市委在许多工厂、学校成立了反日会，并在该城成立反日总会。自9月21日以后，街头每日都有抗日宣传，散发传单，号召抗日。同月26日，乘中秋夜色，在共产党、共青团和工会、反日会的组织领导下，工人、学生和抗日群众在道外举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浩大示威游行，许多市民参加了示威行列。群众不顾亲日派军阀张景惠的军警干涉与压迫，坚持斗争。这是哈尔滨历史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空前壮举。

东北城乡人民的反日斗争，不久便迅速地由宣传鼓动、示威游行转为武装反抗了。

### 三、日本制造伪“满洲国”

日本侵略者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之后，关东军便迫不及待地于9月22日抛出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决定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启用汉奸，建立傀儡政权与伪国，将实权操在日本手里，借以使东北与中国脱离，给日本赤裸裸地侵占中国东北的强盗行径披上一件“合法化”的外衣，妄图遮人耳目。经日本关东军的一手策划，一些汉、满民族败类，如熙洽、赵欣伯、袁金铠、于冲汉和臧式毅之流，便摇旗呐喊，开始发起所谓“独立”与“自治”运动。

首先宣布“独立”的是吉林省的大汉奸熙洽。经日本关东军的筹划，9月26日，即成立了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由熙洽充任长官，宣布与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实行“独立”。但是，这个伪政权的实权却掌握在由日本人组成的顾问团手中。

日本侵占沈阳后，9月20日便由其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出任市长。不久，为欺骗世人，又推出由日本豢养多年的汉奸赵欣伯充当奉天市长。同时，成立“奉天自治维持会”，以汉奸袁金铠为委员长，代行省政府职能，宣布与张学良和南京断绝关系，并

将辽宁省更名为奉天省。12月15日，这一“维持会”又宣布解散，16日即由前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出任伪省长，日人充当“顾问”。

由于以哈尔滨为首府的东省特区日军尚未侵占，该特区长官张景惠在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的策动下，于9月27日宣布组织“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未立即公开其汉奸的丑恶面目。不久，在同年11月19日日军侵占齐齐哈尔、马占山抗日暂遭挫折之后，张景惠才于1932年初发表“独立宣言”，并赴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主席伪职。日本侵略者同样组成日人顾问部，掌握黑龙江省实权。

此外，在日本关东军的积极策动下，吉林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延吉镇守使吉兴、辽宁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等分别于1931年秋冬先后投敌，自任保安司令等伪职，甘心充当敌人的爪牙。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还积极着手筹组全东北的傀儡政权。关东军在此期间按既定计划，于11月初特派土肥原至天津劝诱溥仪出任伪国“元首”。土肥原一手制造了天津日租界汉奸便衣队向华界的挑衅事件，继而以保护溥仪“安全”为名，乘机将这个梦想复辟的清朝废帝挟持到了东北。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在国际联盟组织的李顿调查团来到东北之前建立起傀儡国家，造成既成事实并给人以假象，经过日本政府、关东军的紧张筹划，终于在1932年2月26日，由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各省汉奸在沈阳召开了“建国会议”。遂即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并以它的名义发表宣言，妄称“独立”。3月1日，宣布伪满洲国的成立，年号“大同”，首都长春并改称“新京”。3月9日，傀儡溥仪当上了伪国的“执政”。第二天，溥仪出面公布了由关东军早已炮制好的伪政府成员名单，由郑孝胥充任伪国务总理，臧式毅任伪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熙洽任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张景惠则任伪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别区长官等职。

同日，溥仪以致关东军司令官函的形式，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项卖国密约。该密约规定：伪国的国防、治安均委由日本负责，所需经费则由伪国负担；日军所需之铁路、港湾、水路、航空及新路之布设，均委由日本管理；日军所需之各种设施，皆由伪国援助；伪国各级政府官员日人均可充任，日人官员之任免皆需经关东军司令官保荐或同意。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一天，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又签署了《日满议定书》。该议定书承认过去日本和日本人所获得的一切权益；确认日军长期驻扎于“满洲”。因此，伪满洲国名为“独立国”，实际上则完全是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成为名符其实的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关东军司令官对伪国的统治和控制，除各项条约规定之外，还通过在伪政府中任职的日人所组成的统治体系实现。即在伪政权机构中，国务总理、各部总长虽然都由汉奸担任，但实权却完全操纵在由日人担任的总务厅长和各部次长手中。各省均都如法炮制，加强控制。

伪“满洲国”徒具虚名，是货真价实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 第二节 东北各地抗日义勇 军风起云涌

### 一、嫩江桥抗战，黑龙江救国军等部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辽宁、吉林主要地区之后，为尽早实现其侵吞满蒙的野心，便积极策划向北满进攻，继续侵占黑龙江省。为减少阻力、顺利实现这一目的，日本关东军选择了避开中东路，绕过哈尔滨，沿四（平）洮（南）铁路北犯的进军路线。这条路线，既可暂时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又能利用铁路迅速运送侵略军和军事装备，利于持续作战。

黑龙江省驻军与警察保安队共约3万人。事变发生时，省长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却在北平，省城齐齐哈尔防卫薄弱。为防御敌人进攻，省内驻军调整、加强了敌军来犯必经之路上的嫩江桥同齐齐哈尔城的防务。10月10日，为安定人心，统一军政指挥，张学良任命当时驻守黑河的该地警备司令、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主持该省军政事务。但是，当马占山尚未到齐齐哈尔就职时，日本侵略者就已指使伪军发动了进攻。

汉奸张海鹏投敌不久，在日本侵略者的诱使下，经过紧张的准备，扩充了队伍并由日军予以补充军械，于10月13日倾其全部兵力三个团，自洮南向北进犯。16日，攻击嫩江铁路桥，日军出动飞机助战。江桥守军沉着应战。当来犯之敌军旅长徐景隆触爆江桥守军埋置的地雷被炸死、军队大乱之际，守卫江桥部队乘

势出击，敌军立即全线溃退，败归洮南。黑龙江守军遂将嫩江桥炸毁三孔，以防日伪军再来进犯。

此时，马占山自黑河抵达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职，发表宣言，决意抵抗敌军的进攻，加强江桥及纵深的防务。

日本侵略者利用伪军侵占黑龙江省不成，便调日军多门师团，借口黑龙江守军炸毁江桥，损害日本权益，再次进犯。11月4日，日伪军集中兵力向嫩江桥实行大规模进攻，黑龙江守军当即予以还击，著名的江桥抗战爆发，历时16天。

11月4日，日军从早至晚，接连几次进攻均被黑龙江守军打退。第二天，日伪军又以8000余名兵力、100余门大炮，发起强攻，但又为誓死抵抗的守军所击退。日军死167名、伤100余名，伪军张海鹏部死伤共达700余名。第三天，日军又增调兵力和加强重炮等火力，从凌晨便大举进攻。守卫江桥的广大中国官兵，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奋勇杀敌，激战一日，敌军又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日军滨本步兵联队已几乎被全部歼灭，高波骑兵团也所余无几。黑龙江守军亦伤亡600余人。守军因连续作战三天，十分疲惫，工事多被日军猛烈炮火所摧毁。马占山为保存实力，以利再战，下令乘夜撤离江桥阵地，退至三间房一线扼守新的阵地。

从此，江桥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日本关东军一面施加政治压力，提出马占山下野，撤退齐齐哈尔驻军，由日军进驻昂昂溪等无理要求；一面调兵遣将，准备新的进攻。马占山对于日军的要求，均一一驳复。日军便以天野、长谷、铃木等旅团和满铁守备队等共7000余众，在11月12日兵分三路，又开始了新的进攻。马占山亲自指挥守军浴血奋战，英勇阻击，连日挫退敌军，阵地失而复得。黑龙江守军虽伤亡很大，但士气高昂。日本侵略者因见其侵略军进展仍然不大，遂又速派两个混成旅团驰援，17日开到，即刻发起总攻。由于敌军投入了优势的兵力，黑龙江守军连

日苦战，前线兵力仅余 4 000 不足防守，弹药奇缺，实在无力继续坚守，马占山不得不下令各部守军撤出三间房阵地，向齐齐哈尔退却。19 日，日军侵入黑龙江省城，马占山率余部再退克山、拜泉一带。

嫩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爱国官兵置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于不顾、第一次大规模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历史壮举；江桥一役，迫使敌人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大大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猖狂一时的嚣张气焰，延缓了它的侵略步伐；江桥抗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各族人民的爱国意志，推动了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迅速兴起，揭开了东北军民长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斗争的序幕。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的 9 月 23 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中，就指示各地党组织，发动士兵反对缴械和拒绝长官执行不抵抗命令，还指出如果有占领当地反抗日军进攻的力量，必须利用这一时机领导他们，反抗日军的进攻。江桥抗战开始后，满洲省委和北满党组织认为这是执行上述决议的良好时机，便大力发动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组成“抗日援马代表团”赴战地慰问，许多学生换上军装投笔从戎，被马占山编为“学生团”。

此时，全国各地对马占山在江桥抗战一致声援，信件和电报如同雪片飞来，报章书刊热情赞扬爱国官兵抗敌义举；各界人士和爱国华侨更发起募捐。在东南亚华侨中，一些社会团体为募捐将马占山的照片以每张定价五元销售，人们仍然争相抢购。全国一时群情振奋。

但是，马占山自退守克山、海伦后，虽然重整部队，扩编地方武装，准备再战；同时，却由于当时目睹锦州失守、哈尔滨保卫战失利和日军进攻上海、南京政府仍不派兵支援东北抗战的情

景，感到前途渺茫。以至在1933年初，在敌人加紧诱降的政治攻势之下，听信日伪关于可以实现联省自治的诺言，一度动摇失节。同年2月，马占山赴沈阳参加了筹建伪满洲国的“四巨头会议”，承担伪黑龙江省长职务，同年3月，又参加溥仪就任伪“执政”的典礼，并被任命为伪军政部部长。马占山的这一变节行为，立即遭到全国舆论谴责，其旧日部属如原黑龙江省边防军署参谋长谢珂等愤然出走，许多部队不听调遣，倍感孤立，加以无事不受日人掣肘形同傀儡的感受等等，便又促使他很快改变立场，并在4月2日从齐齐哈尔出走，在黑河重组黑龙江省政府，宣布继续抗日。

马占山重新抗日的行动，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各部抗日义勇军的欢迎。他将由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的红枪会、大刀会等抗日武装编为11支义勇军，又将原有的抗日部队整编为九个旅，共同组成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马占山任总司令。这支部队，此时不但数量增加，而且使之由原来的正规部队发展为具有更广泛的民众基础的抗日武装。4月初，马占山曾派代表与吉林自卫军李杜等部协议联合进攻哈尔滨。为此，由4月末至5月中旬，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曾分别进攻与哈尔滨市区仅一江之隔的松浦镇和马家船口，予敌军以重大打击，使人心振奋。

5月下旬，日本侵略军集中兵力猛攻马占山部队。结果，虽经血战呼海路与齐克路，其沿线城镇呼兰、绥化、海伦、克山、拜泉等仍然相继失守。此后，马占山率领部队东征下江，到农村地带开展游击战争。同年9月，马占山部队辗转西进，与正在酝酿抗日的苏炳文部队联合起来继续抗日战斗。

此时，驻在中东铁路西段海拉尔一带的前任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警备司令兼中东路海满护路军司令、第二旅旅长苏炳文，正与护路军副司令、第一旅旅长张殿九酝酿正式抗日。马占山指挥江桥抗战时，苏炳文曾派兵一团前往助战，尔后也一直与日伪政

权保持距离。在马占山重新抗日后，日本侵略者对苏炳文、张殿九等人便由拉拢收买进而威胁。苏炳文便于1932年9月23日在海拉尔召集会议，决定举旗抗日。27日，在哈满路段沿线各部一致行动，断绝与富拉尔基以东的联系。10月1日，在海拉尔正式誓师抗日，组成“东北民众救国军”，苏炳文任该军司令、张殿九为副司令、谢珂为参谋长。

苏炳文举旗抗日，得到爱国群众的积极支持。中共党员宁匡烈由救国会派遣到海拉尔，组织东北民众救国会，发动群众支援苏炳文部的抗敌斗争。后来，苏部民众救国军在日军侵占富拉尔基后为阻止其继续西侵而炸毁一座铁路桥梁时，这支炸桥的工兵队就是由宁匡烈等训练的。

苏炳文等率部抗日后，在同年10月便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争夺富拉尔基的战斗，曾几度易手。同时，该军又与马占山抗日救国军取得联系，约同围攻齐齐哈尔。为此，马占山旧部朴炳珊等连克泰安、克山，切断齐克路；邓文部攻下安达，沿中东铁路西进，直逼齐齐哈尔；南路李海青部义勇军在苏炳文部支援下，占领昂昂溪车站。日军占据的齐齐哈尔呈现危急局势。

11月中旬，敌人急忙从各地调集大量日伪军向抗日义勇军各部分别展开攻势，以解齐齐哈尔之围。此时，抗日武装各部终因相互间缺乏联络，为敌军各个击败，齐齐哈尔的围攻战遂告失败。并且，从此黑龙江省各路抗日武装皆呈现衰落之势。11月末，日军沿中东铁路向西北猛攻，苏炳文部民众救国军虽经抵抗，仍不得不退向满洲里。同时，马占山部邓文部队亦于11月下旬遭敌围攻，由于寡不敌众，弃守拜泉，绕道南去。

马占山与苏炳文见大势已去，于1932年12月初相率越境入苏，然后分别转道回国。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与东北民众救国军的余部同李海青等抗日义勇军则转战热河、绥远等地。还有一部